

■专题:婴幼儿照护服务

早期教育:从“质量话语”走向“意义生成话语”

——来自《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的启示

蔡 苗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在发达国家的早期教育领域中,资本扩张、早期教育机构追逐、社会大众追捧使得质量话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一书中,三位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主张超越“质量话语”,追求“意义生成话语”。然而“质量话语”的存在可以为早期教育发展树立标杆,提供参考依据,而且在我国早期教育领域中,质量话语仍处于一种不被重视的尴尬境地。因此,现阶段我国的早期教育发展不应该贸然超越“质量话语”,追求“意义生成话语”,而应该在重视“质量话语”的前提下,逐渐走向“意义生成话语”。

关键词:质量话语;意义生成话语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20)01-0014-06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0.01.003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from “Discourse of Quality” to “Discourse of Meaning Making”——Inspiration from Beyond Quality and Early Education and Care

CAI Miao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Capital expansion, the pursui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pursuit have made discourse of quality dominant in the field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book of Beyond Quality and Early Education and Care, three scholars raised their doubts and advocated that we should go beyond the stage of "discourse of quality" and pursuing the stage of "discourse of meaning making".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discourse of quality" can set up the standard for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used as a reference basis. "Quality of discourse" is always ignored in the field of earl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So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should not rush up to the stage of "discourse of meaning making" which should be pursued on the premise of "discourse of quality".

Key word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iscourse of quality; discourse of meaning making

一、《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概述

《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以下简称《超越》)一书的三位著者分别是来自加拿大、瑞典、英国的三位学前教育专家冈尼拉·达尔伯格、彼得·莫斯、艾伦·彭斯。

冈尼拉·达尔伯格一直在瑞典从事不同的学前教育研究项目;彼得·莫斯主要致力于研究不平等在幼儿的生活尤其是贫穷国家,对儿童早期教育、伦理和政治的影响;艾伦·彭斯大部分工作集中在创造高等教育的方法,抵制殖民主义思想,并向不同的和当地的理解敞开

收稿日期:2019-10-05;修回日期:2019-11-15

作者简介:蔡苗,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大门,作为建立适合社区、可持续的儿童方案的关键声音。从1999年至2007年他们一直共同致力于早期教育质量研究。

作为发达国家的公民,《超越》一书的三位著者并没有深陷于本国强大的经济背景,没有同世人一般在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迷失自我,没有人云亦云,即不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处于一种非反思状态,即对塑造我们的影响听之任之”^{[1]40}。他们认为,当今的时代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令人不安的前景:儿童早期教育领域正越来越被一种技术探索所主导,寻找着一种普遍而乏味的“最佳实践”,通过质量的概念来进行评估。

二、产生质量话语主导地位的原因

(一) 资本扩张的宏观需求

三位学者开篇就论述到,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优先的大背景下,市场与效益引起了商人的重视,从大生产时代到“弹性积累”^①的转变,管理企业资本、降低贸易风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进军全球市场成为强势跨国公司的前进目标。英美等国家对质量高强度控制的目的之一在于打开世界市场,输出本国产品,牟取利润;通过标准化的规定实现垄断市场、控制社会资本的目的;通过对质量话语主动权的掌控,制定标准,掌握核心技术,以市场为导向,从而达到资本扩张的目的。这种通过标准化的质量话语垄断技术和资本的现象,即使在早期教育领域中,也未能幸免。质量话语将早期教育机构划分为结构、过程和结果三个分离的片段,“我们建构了分类系统,从而把儿童的生活纳入了一个标准化的过程中,由此也建构了教师和儿童,以及他们各自的期望和社会实践……”^{[1]42}

(二) 早期教育机构的发展需求

早期教育机构对质量话语的追求也不在三位学者意料之外。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世界中,为了掌握市场的主动权,体现机构自身的高质量,突显自身教育的独特性,早期教育机构拥有者试图寻找一名“代言人”直观地向大众表述这些优点,而质量话语就是那名被选中的出色“代言人”。在人们普遍追求质量、注重数据的时代中,它以一份直观的报告展示在公众眼前,更容易提升机构的可信度,从而获得大众的青睐、社会的认可。在功能上,早期教育机构主要以产出标准化的、预设的儿童为特点。而对于标准化儿童的界定,如果没有质量话语的介入,又怎能体现儿童是否“达标”?又怎能凸显早期教育机构的优势?又如何能证明因为早期教育机构的介入而使儿童获得了更

好的成长呢?

(三) 社会大众的追捧

在现代运动观点的引领下^②,人们“渴求放心胜过理解,宁愿相信专家评估也不愿承担自己做决定的风险”^{[1]102}。“质量话语”应运而生,为家长提供了准确和清晰的方向,减缓了家长在选择上面临的风险。探索发现是人的本能。我们对未知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和想象,喜欢刨根问底,但是在寻求的过程中由于有太多难以预料的可能,我们无法预知可能面对的结果,从而逐渐形成对新事物恐惧的心理。儿童成长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未知和可能性,不可预测的发展、对诱惑的未知使得父母本能地远离,却又不自觉地被吸引着进一步去观察和研究儿童。人们开始渴求使用确定的一致性的语言去描述儿童、读懂儿童,而“质量话语”恰恰体现了权威、明确和统一,它为家长提供了一种途径去看穿儿童、了解儿童。这也正是为何许多家长对标准化的“质量话语”趋之若鹜。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教育机构和社会大众对质量的追逐与需求,标准化、系统化、客观化的质量话语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盛极一时,并逐渐在早期教育领域中占据核心位置。

三、质量话语的疑窦

(一) 对质量话语霸权地位的质疑

质量话语是否真的能带来人们所想要的一切呢?在一片歌颂质量话语的时代声音中,三位学者开始思考,是否质量话语就是早期教育发展评价最好的归宿呢?作为长期致力于学前教育质量研究的三位学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1. 标准化儿童诞生

在现代主义观点的支持下,质量话语在早期教育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人们将儿童看作是原材料、空容器。儿童在成人的眼中是白板,是无知的生物,是需要被灌输知识的空瓶子;儿童的童年是按照既定轨迹运行的。“我们对儿童及其生活视而不见;他们的具体经验,他们的实际能力,他们的理论、感受和渴望都被忽视了”^{[1]43}。在质量话语的引领下,标准化的儿童模板被塑造出来。所谓的专家根据手中的量表对儿童指指点点,将每一个鲜活的儿童变成了一堆冰冷的纸上数据。与此同时,课程面对的是幼儿,拍板决定的却是父母^[2]。更多的早期教育机构为了满足父母对儿童的期待,不断将质量评价引进课堂,对儿童进行测评、定性,父母的求知欲望被满足了,孩子成功地赢在了起跑线上,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这种认为儿童是空的容器、原材料的儿童观所引起的一种理念就是,教育是一种以预定的方式灌输给儿童,儿童可以通过教育积聚一个预先决定的、没有疑问的知识体系。质量话语使“儿童被看成是自然的或者是具有生物阶段的科学儿童观”^{[1]52}。

2. 商品化知识出现

三位学者通过对当下早期教育机构中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在早期教育机构中,为了追求质量、达到标准,课程的制定更多指向结果而非过程。知识被固化、被标价,成了待售出的商品。“儿童早期教育机构逐渐转变为官僚组织的、相对自主与消费者导向的机构……它们越来越变成了标准化的商业公司,父母与孩子更好地被认为是社会成员,更多地被看作是服务的顾客,只是被包装成能在市场出售的某种信息或商品”。早期教育机构成了提供服务的商业公司,知识成了被贩卖的商品,父母成了被满足的群体,而儿童成了这场买卖中的受害者。知识是那些自认为知识很渊博的人馈赠给那些他们认为无知的人的一种礼物^{[3]25}。这种观点否认了知识的获得是在教师指导下由幼儿自主探究发现的过程,儿童的生活经验被弱化了,教育是预先准备好的,教师与儿童是对立的关系。教师的作用在于将知识灌输给儿童,而儿童是一个被动接受的容器。

机械式的划分将儿童看成被检测的产品,将早期教育变成模块与模块之间的简单叠加,评价标准中维度与维度泾渭分明。儿童在其中被抽象化和去情景化,是被本质化和标准化的范式,而早期教育机构是将知识商品化的卖方,教育问题成了科学问题、心理学问题和社会学问题,教育的情境性、特殊性、独特性被淹没了数据下。

(二) 质量话语应被取代——追求“意义生成话语”

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对理性、集体、制度和秩序的强调^[4],反对中心性、同一性,主张解构现代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由于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强势入侵,质量话语如百孔千疮般不堪一击。在此基础上,三位学者结合实际情况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主张在早期教育的评价中采用“意义生成话语”取代“质量话语”。

1. 何为“意义生成话语”

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三位学者认为,知识是儿童自由建构的,而非教师灌输给儿童的。因此,主张在早期教育领域中意义生成话语,强调应该将建构和深化对早期教育机构及其相关工作的理解置于首

要地位,特别是教学工作——要使所发生的事变得有意义^[5]。因此,在实际中,意义生成话语主张早期教育领域应注重生成性课程——一种活的课程。生成性过程带来的是过程的真实性和结果的多样性,而非确定性、程序性和准确性。意义生成话语使得教师不再是位于知识顶端的高位者,儿童也不是一味顺从接受的低位者。相反,他们是一起成长、进步的学习共同体。教师必须学会倾听、观察、提问、理答的艺术,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掌握提出新问题、新技术,引发幼儿讨论的技巧,幼儿园教师应该具有生成性、整合性和自主性的特征^[6],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和搬运工,所实施的活动应使儿童明白世界是多角度的,是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

2. “意义生成话语”中的儿童与早期教育机构

在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引领下,三位学者认为,儿童是“富有的儿童”。儿童在教育过程中不是被动接受的容器,而是能够主动选择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质量话语”使儿童脱离了环境,儿童期成了有着特定的生物学成长顺序,成了机械式地完成成品的流水线。意义生成话语反对将儿童简单视为空容器的观点,主张儿童成长的环境信息与其他不可测的影响因素是不可被忽视的,所有的儿童都是智慧的,都是“充满潜力的、强大的和有能力的个体”,“是知识、身份和文化的共同建构者”^{[1]148}。每个儿童都是特别的、复杂的、有个体特征的对象,“意义生成话语”认为,我们应该用建构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儿童,看待儿童与成人、与早期教育机构、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书中提到儿童早期教育机构应该是“服务于幼儿儿童‘此时此地’的生活空间”^{[1]93}。早期教育机构应当被视为生活空间而非产品运输地、知识贩卖地,儿童应被看作鲜活的个体而非等待填充的容器。“‘论坛式’的儿童早期教育机构应该是面向所有阶层的公共资源,应该为儿童提供尽可能多的思想,供儿童自由选择”^{[1]84}。教育是根据自身需要摄入重组编码知识的过程,而非复制粘贴式的机械运动。我们在对儿童进行教育、研究的时候,不应该将儿童从生活环境中孤立出来,而应该把儿童放在其实际生活的背景下。“我希望我们的学前教育是一种没有围墙的教育,是在开放论坛上的教育”^{[1]129}。

“意义生成话语”为我们敞开了一扇大门,使我们开始思考“质量话语”的不足,开始审视这种确定性语言对我们的意义和价值,开始反思这种单一性语言给我们带来的危机和风险。

四、对质量话语质疑的思考

质疑并不都是悲观的、消极的,虽然它使人们感到不适和有风险,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带领着我们走出舒适圈,反思审视自身,开始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批评也不是我们嘲讽与悲观的原因,相反,它能带来新的可能性和希望,它使我们开始深思现状。对质量话语的质疑和批评开始引发专家学者全面审视早期教育的现状,开始全盘考虑早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但质量话语是否真的如三位学者所言一无是处呢?尽管三位学者对当前早期教育领域中充斥着质量话语的现状进行了批判,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局限于这本书的观点,循着三位学者的思路一味接受,一味批判“质量话语”。对某一事物的评价要避免“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维。真实世界就如《道德经》形容的“负阴抱阳”一样,万物皆有其存在的意义,质量话语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 质量话语为管理部门提供标准

对于国家而言,质量体系的存在使教育管理部门可以从宏观上判断国家早期教育的现状,如确定不同地区早期教育质量发展的情况;从大局上制定发展目标,避免不同地域存在大相径庭的标准体系;从总体上提出改进措施,实现宏观调控,引导各地区的早期教育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同时,对不同的早期教育机构也有一套相对公正严谨的评判标准,有可供依循的规章制度,从数据上判别某一早期教育机构是否达标,是否存在违例或不符合规则的地方,对需要整改的机构从全局上提出修整意见。从质量入手还可以在根基上提高国家早期教育水平,从源头、制度、根本上推动早期教育的发展。对于社会大众而言,质量标准的出台也为他们监督、评价早期教育发展提供了平台和依据。

(二) 质量话语为早期教育机构树立标杆

《超越》一书对质量的质疑具有启发性,对早期教育领域中质量话语的批评也是切中要害的。但细细想来,如果没有质量的存在,没有广受认可的标准,那么早期教育机构就失去了参照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幼儿?我们这样做是否正确呢?幼儿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支持与帮助?这些问题在丢掉质量话语的同时也会由然而生。对于早期教育的管理者而言,质量话语使他们必须不断提升机构的品质,不断改进机构的运营观念和教学理念,使之更贴合公众的需求,他们必须基于质量体系思考如何制定课程,如何改进教学方式,如何更好地满足家长,对待幼儿。在自由准则下将会导致更少的机构管理者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只会

想方设法地思考如何更好地创收,而无法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而对于所要培养的幼儿品质也会因机构而异,有的早期教育机构认为美育是重点而强调艺术课程的重要性,有的早期教育机构认为健康体魄是首要的,有的机构觉得养成健康的生活卫生习惯是重要的,而有的机构认为德育才是第一位……如果没有质量话语的存在,失去了参考体系和标准,就会出现以上所阐述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整个早期教育领域也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中。

(三) 质量话语为家长提供选择依据

站在受益者——家长的角度思量。首先,早期教育领域中的质量体系可以为家长提供“定心丸”作用。对于好与坏的评估不再是仅由个人经验进行判断与断言的,提高了对机构质量优劣评价的准确性和合理性,为家长的选择提供了指向性和明确性,而且质量话语可以比较全面直观地显示该早期教育机构的优势所在,有利于帮助家长选择更符合自家孩子性格特点、成长需求的早期教育机构。其次,质量话语帮助家长更加全面的了解儿童,认识儿童,特别是对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而言,质量话语可以更加准确地对这类儿童进行检测,并提醒家长及时介入;使超常儿童获得超常儿童教育,减少“伤仲永”悲剧的发生;而智力落后、身体有缺陷的儿童可以获得补偿性教育,减轻缺陷带来的损伤。最后,质量体系帮助家长更加全面地评估教育结果,更加直观地探索幼儿的成长途径,从文本报告中科学地了解儿童的发展和进步^[7]。

《超越》一书的三位学者主张,我们应接受世界的不确定性和知识的暂时性,抛弃追求确定性的心态^[8],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将此简单等同于:我们什么也不信,什么知识也不建构。“现代主义从不会冒自由的风险。后现代主义也不是永远都是一贴灵丹妙药,但它也不是没有成效的”^{[1]85}。

五、对我国早期教育发展的启示

纵观我国,从《大戴礼记·保傅》一书孔子对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解说:“少若成天性,习惯之为然。”^[9]到《袁氏世范》一书明确提出“教子当幼”,强调“如果从小时起就教儿童如何分辨好坏,那么长大之后便没有做坏事的情况出现”^[10]。可见,我国对早期教育的关注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但近百年来的发展显示,我国早期教育的发展一直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而且对引进来的早期教育理论可谓趋之若鹜。对学前教育工作者而言,目前更重要的应是立足于当前国内早期教育现状,深入思考如何在借鉴国外优秀教育管理经验的基

础上促进我国早期教育质量的发展。

质量话语与意义生成话语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选择质量话语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忽视、放弃了对意义生成话语的追求,反之亦然。尽管三位学者对质量话语提出了质疑,并大力推崇意义生成话语,主张在欧洲等国家中运用意义生成话语代替质量话语,但是在我国,质量话语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当务之急应该是正视质量话语的地位,打破依赖少数人的经验和价值取向评判早期教育机构质量,正确理解质量话语的意义,将标准分数视为参考值而不是神谕。

(一) 质量话语在我国早期教育领域中的地位

在我国,尽管早期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正逐步提升,但具体到早期教育质量这一部分时仍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诸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早期教育质量受到一定的重视,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而在偏远地区,早期教育的质量发展仍未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整个早期教育处于一片混沌中,仍处于追求“质量话语”的阶段^{[11]198}。但即使是在关注质量的城市中,质量一词也仍未形成政策抉择,仍存在由管理人员任意制定等不良现象,而且在制定过程中未经过专业的调研和考证,其目的仅是单纯为了管理上的便利,而并非将着力点放在儿童和机构身上^[12]。2012年《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颁布体现了国家对儿童发展的重视,自其颁布以来,各省市开始从“标准”上关注儿童的发展,然而在早期教育领域中仍然未有一套较为系统的评价指标,仍未有一部法律是专门针对早期教育质量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我国早期教育依然处于“人治”而非“法治”的阶段,质量评估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估人员的专业性。因此,当务之急应是结合我国早期教育的特点,制定关于早期教育领域的评价体系,建立早期教育质量话语体系。相对于凭借少部分人的经验去评判一个机构的正规性和质量的高低,集结众多专家学者去调查儿童的身心发展需求,在建构早期教育机构的共识中达成共识,从而制定早期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对于现阶段的我们而言,难道不可称之为“超越”吗?

尽管《超越》一书的三位学者对质量话语提出了质疑,但其目的不在于使我们谈“质量”“标准”色变,而是为我们提供一种启迪,引发我们进一步对早期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探寻和对话。审视自身,我们国家仍处于寻求质量的时代中,质量标准在未来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我们需要攻克的目标。

(二) 我国早期教育质量体系的抉择

对于我们而言,追求质量不是单纯地依循国际标准或者照搬国外的质量体系就大功告成的,最好的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不顾自身实际情况机械移植的后果就如照猫画虎。我们应该立足于国内早期教育现状,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入本土国情,制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质量体系。

1. 将质量视为动态变化的过程性语言

在许多情况下,需求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这就要求定期修改规范。质量标准并不是定了框架、写了细则就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人们的需求、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去不断修正的。“标准化的框架本身是社会建构的。因此承载着价值,而不是要揭示先天固有的、价值中立的真理。标准一旦建构完成,仍然需要继续不断地对框架做出阐释。”^{[11]130}

我国国土辽阔,南北差异悬殊,五十多个民族各有其独特的习俗,加上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不同、城乡教育质量差距大等其他因素,拟制定一个普适质量体系的任务更是艰巨的。因此,需要不同群体共同探讨研究。与此同时,我们应在制定全国质量大纲的基础上,允许地方再根据自身发展自行制定独具地方特色的质量体系。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作为过程性语言的质量话语,完成制定、形成体系并不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而是开始。我们应该虚心地接受社会对这套标准的声音,无论是批评的还是质疑的,甚至是否定的;应该紧跟时代需求,不断调整删除不符合现状的条例或标准,留有改正空间。质量标准体系的制定不应该成为某些权力者的“一言堂”,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语言,理应受到大众的质疑和监督。

2. 追求质量话语,逐渐走向意义生成话语

“在意义生成话语下的工作并不排除运行这种标准化的框架,如果有这样的要求:这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11]134}

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价值取向是重传统重权威^[13],正如荀子所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14]374}这种传统文化所导致的结果是家长过分崇尚“专家”“权威”,加上由于从众心理的影响,导致了中国式早期教育的悲剧:教育不是真正为了儿童,而是为了“赢在起跑线上”。作为家长,首先应该改变自身观念,把“质量”“标准”作为指导工具、参考依据而非定性定义的唯一指标。

其次,早期教育机构在重视质量的同时,应该用一种建构的观点看待儿童,而非将儿童视为“知识储存室”。早期教育机构中典型的教育方式是一问一答的

模式,这些问题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开放性的、真正意义上的问题,而是教案上的“文字”,教师预设好的答案,在课堂中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幼儿回答的问题,教师的真正目的不在于“问”,而在于“听”,听幼儿什么时候能说出其心中的正确答案。作为幼儿接触社会的桥梁,早期教育机构应该是为高层林立的小型家庭中的儿童提供与同伴交流的机会,为儿童提供成长的环境与支持的场所。

最后,尽管我们仍处于追求质量话语的时代,但意义生成话语也不是绝对不可触及的。如何正确理解儿童的言行举止,在儿童面前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等问题,都是我们在追求质量话语的过程中也可同步思考的。

六、结语

儿童早期教育机构不是为了建构一片同一的地方,不是为了传递一套“公认”知识体系的地方,也不是为了培养标准化儿童的地方,而是始终对“对话与质疑开放的地方;是鼓励‘不顺从’和质疑,对意义保持怀疑和开放性的地方”^[19]。正确理解“质量话语”的价值,正视“质量话语”的地位,努力走向“意义生成话语”,为儿童的成长创造一片净土,才是早期教育机构的归宿。

[注释]

- ① 弹性积累:指在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消费模式上都表现出充分的弹性,以应对 20 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 ② 现代运动的观点:世界是可知的、有序的,将个体看做是自制的、稳定的、中心的主体。

[参考文献]

- [1] 冈尼拉·达尔伯格,彼得·莫斯,艾伦·彭斯.超越早期教育

保育质量[M].朱家雄,王峥,等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2] 孙刚成,拓丹丹.教育的解放及其实现——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当代诠释[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33(11):34-39.
- [3]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4] 陈利民.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审视[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4):5-7.
- [5] 赵振国.从质量话语到意义生成话语的转变——园本教研与传统教研的生态学视角比较[J].学前教育研究,2007(11):9-12.
- [6] 刘艳金.生命哲学视域下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及其路径重构[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33(1):89-93.
- [7] 李少梅,沈润青.异化与回归:儿童生活视野下的教育精神[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34(10):79-82,87.
- [8] 郭良菁.超越“质量话语”应是我们的政策抉择吗——我们的质量评价可以从《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中吸取什么[J].学前教育研究,2009(2):3-9.
- [9] 甘良勇.《大戴礼记》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2.
- [10] 袁采.袁氏世范[M].李勤璞,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11] 陈亚萍.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2014[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 [12] 王群,李祥,杨川.学前教育政策变迁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9,35(1):1-6.
- [13] 杨丽珠,王江洋,刘文,等.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特点及其中澳跨文化比较[J].心理学报,2005(2):224-232.
- [14] 杨柳桥.荀子诂译[M].济南:齐鲁书社,1985.

[责任编辑 朱毅然]